人生也是一座桥

——扮演茅以升杂忆

石维坚

这是一篇不曾发表的创作手记。有感于前不久报道的刚刚建成十四年的钱塘江三桥出现的垮塌事件,不由让我想起茅以升先生。

作者(右一)在北京医院看望茅以升

一九八六年底,钱塘江大桥——这座在我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大桥建成五十周年的前夕,我们拍摄了四集电视连续剧《不屈的桥》。曾经成功导演了优秀影片《寒夜》的厥文,执导了这部电视剧。我被邀请扮演茅以升。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当时,我正在北京西山跟随陈怀凯、高放导演拍摄《曹雪芹梦断西山》。这部戏停机后,我立即赶到杭州投入《不屈的桥》的拍摄,中间只有三天的时间。这时我的脑子里还都是曹雪芹,对茅以升起码的了解都没有,怎么谈得到创造这个形象!怎么办?只能凭经验演。一天拍下来,我突然觉得非常可怕。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在我们对所要扮演的人物已经心中有数时,在拍摄中它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像我这样运用所谓的"经验",却丢弃了演员工作中最重要的内涵——创造性。创造性可以说是演员工作的生命,丢弃了创造性,就是丢弃了生命。不对人物进行研究,不去进行创造,所谓凭经验演戏,实际上是自欺欺人,是在混饭吃,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枯萎了。

茅以升(作者饰)在钱塘江大桥上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请求导演再给几天时间,让我能按一个演员应该做的那样,在接到一个新的角色之后,对自己进行"消磁",从零开始投入到一个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中去。让我阅读有关茅以升的文字资料,观看茅以升的影片资料,去熟悉、了解茅以升,取得扮演茅以升的最起码的资格。厥文导演作为一个艺术家,给予我充分的理解,在剧组日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毅然给了我几天宝贵的时间。

茅以升是镇江人,是唐山交大的高才生,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由于他的优秀,康奈尔大学做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决定:凡是茅以升的母校——唐山交大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进入康奈尔大学。茅先生和我都是江苏人,是大同乡。在外形和知识分子这些基本气质方面,我们是接近的。《不屈的桥》是以他修桥又炸桥为中心情节的。那么,为什么修桥?又为什么炸桥?这两个问题,是两把锁,也是我进入茅以升内心世界的两把钥匙。

中国,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就已经修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不论在造桥的技术、艺术、学术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成就。可是作为桥梁专家,茅以升所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时著名的兰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造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造的;中国铁路桥梁的建造,完全被外国人垄断了!中国人修建铁路桥梁的历史,是个零!这使他这个桥梁专家深感无颜面对自己的学生,更无颜面对全国的百姓。他立志去突破这个零的历史!可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开始筹备修建钱塘江大桥时,正是国难当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日本军队又侵占了东北及热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他列强对中国人要自己建造铁路大桥的设想,更是嗤之以鼻,认为建桥这样的大事,非他们莫属,一些崇洋媚外的家伙也跟着推波助澜。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很复杂,从秦始皇到今天,杭州就流传着一句话:钱塘江上造桥——根本不可能。这使得建桥工程,从筹备期间就困难重重。这时建桥的困难已远不止于技术方面了。茅以升被比喻为唐僧,造桥如同上西天取经,要遭遇九九八十一难。茅以升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接受在精神、意志、品质、技术等方面的巨大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他们不仅没有低头,反而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工程的质量。这里有两件有关茅以升的传说,给了我很多形象的启示。一是说他在修建铁路时(钱塘江大桥是公路、铁路两用桥),他要求在钉狗头道钉时,为了保证质量,只允许砸两锤。有一次检查工作时,一个工人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他马上指出其错误,工人不服说有铁轨挡着,不可能两锤就砸好。茅以升二话没说,拿过铁锤"铛"的一下,就把道钉钉好了。还有一件事说的是所有的焊接点他都要仔细检查,稍不合格,必须返工。有人不服,认为自己焊接的没问题,他就拿起铁锤砸出毛病让那人自己看。对工程的一丝不苟,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是他的特点。就这样,茅以升和他的伙伴们,在重重困难面前没有止步,他们冒着各种刁难,克服资金短缺、地质条件复杂、敌机轰炸等等困难,在一九三七年终于建成了钱塘江大桥!

可是就在这时日寇的侵略战火已快燃烧到钱塘江边。日寇开始是用不断轰炸阻止大桥的修建。随后又派出先头部队,妄图抢占大桥,作为他们南下江西、福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要道。为了不让敌人阴谋得逞,炸掉大桥势在必行。面对刚刚建成的大桥,面对这用血与火写下的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第一笔,如何下得了手!茅以升和他的同事们痛苦万分,但他们毕竟是识大体的豪杰。在坚持两天通过了两百多辆客货车和两千多辆机车,完成了撤退任务之后,茅以升亲笔写下"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誓言,便亲手把大桥炸毁!

我把自己对茅以升的认识和理解,向导演汇报,听取导演的意见,和导演进行切磋,这不仅使茅以升这个形象在自己的心中活起来,还使我的艺术生命得以恢复了活力。今天回忆起来,我仍对厥文导演怀着敬意与感激之情!

茅以升,是我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一个光辉的名字,是中国铁路桥梁之父。全国解放以后,大桥终于得以修复。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日见老化的旧钱塘江大桥,已难以适应日益蓬勃发展的经济需要。年逾八旬的茅以升先生,又向全国人大提交修建钱塘江二桥的提案,并亲自到实地考察,指导并参与二桥的设计和修建。他十分感慨地说:"人生也是一座桥,她的名字叫——奋斗!"

《不屈的桥》这部电视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集,茅以升这个形象却要从四十来岁演到八十来岁。我当时已经五十来岁,所以在化妆上两头都要够一够,从我的本人条件来说,化年轻妆还比较容易,老年妆就难多了。为此,我和化妆师高建清老师,反复进行试妆,总感到化妆的痕迹重,影响形象的真实性。最后,我和高老师商量,干脆在戴了白发头套后,脸部只化些骨骼,眼角、嘴角等处不化线条,也不用乳胶粘,由演员控制自己脸部的肌肉和眼神,表现出老年人的感觉来。后来,在北影影视部审查该片时,影视部主任问道:"老年茅以升是谁演的?"听了这句话,高老师和我相视而笑,心里暗暗得意。

这部戏在创作中,还有一件与创作规律相悖的事,那就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我才见到茅先生。那是他的一位学生写信和我联系的,当时茅先生已经病重,正住在北京医院,我在病房里拜访了他老人家。老人家已无力多说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能表现那段光辉的建桥历史,是非常高兴的,所以在病房中还和我及他的学生合影留念。

当事隔多年后,又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茅以升先生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人生也是一座桥,她的名字叫——奋斗!

庆祝建党90周年文艺作品征文
中国文化报社
中国散文学会 主办

第一封信时间的考证

对孙犁致徐光耀

赵长青

近日,在网上读到徐光耀先生在孙犁先生逝世后不久所写的《追思孙犁老师》一文。读后,深为两位文学前辈真挚的友情所感动。文中提到,徐光耀先生共收到孙犁先生四十八封信。这些信,我都读过。孙犁先生的作品集《曲终集》收录了二十三封,书信集《芸斋书简》将四十八封全部收录。在读这些信的过程中,一封落款时间标注为"(九〇)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曲终集》中,这封信排位第一;在《芸斋书简》中,这封信排位第三。通过反复的比对,认真的分析,我认为,这封信标注的年份是错误的。

据徐光耀先生在《追思孙犁先生》中记述:"一九六一年,孙犁大病一场,休养一段时间后,天津市委派了一辆吉普车,让他到想去的地方转转……他先到了白洋淀,而后来到保定……在之后的时间里,我领着他到处转。带他去看了我曾采访过的一位在洪灾中涌现出的很活泼的女劳模李桂花;又去了一亩泉、抱阳山,并在抱阳山的托山树下合影留念。我非常珍视这张合影……也正是这张合影,引发了我们的通信。他回天津后,我将照片洗出寄给他。他很快回了信……"根据文中所引用的孙犁先生回信的内容可知,孙犁先生写给徐光耀先生的这封回信,就是落款时间标注为"(九〇)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那封信。需要指出的是,或是因为徐光耀先生记忆有误,或是因为此文编辑校对有误,此文中所说的"一九六一年"也是可疑的。文中云,徐光耀先生曾带孙犁先生去看他曾采访过的在洪灾中涌现的女劳模李桂花。在徐光耀先生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中载:"在一九六三年……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孙犁先生在致徐光耀先生的这封信中云:"李桂花那个人物,确实可作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又云:"很希望早日读到你写的剧作。"通过对照可知,当时,徐光耀先生正在创作那部抗洪救灾的大型剧作,并且,他为此已经采访过李桂花。可见,当时的时间应为一九六三年或之后。另,孙犁先生在《曲终集》中《寄光耀》一文中云:"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要回老家看看,路经保定。光耀那时还戴着'帽子',情况已经缓和,他陪我到保定附近的半亩泉、抱阳山游玩了一番,还给我照了几张相片。"这里所说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与徐光耀先生所说的"一九六一年"亦不一致。这里,与徐光耀先生一样,或是因为记忆有误,或是因为编辑校对有误,孙犁先生所说的"一九六二年"同样是可疑的。同样,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当时的时间应为一九六三年或之后。

其实,对此问题,一些孙犁先生的研究者早就觉察了。比如,靳孙先生在二〇〇二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就此给徐光耀先生写信求证。徐光耀先生在回信中写道:"(一)与孙犁的那次见面,确切时间是一九六三年,那年发一场特大洪水,所以才可能谈到救灾模范李桂花。孙与我的相关文章,都是记忆有误造成的。(二)与此相适应,与孙犁的第一次通信,也确在一九六三年,这在《纯粹的人——》(作者注:文章题目为《纯粹的人,纯粹的作家》)一文中,已把事实说清楚了。至于发表信上所署时间,我记得是编辑者错看或妄改(?)的。因不是太大的谬误,我不曾要求报刊发更正文。这个疏忽导致了您认为的'矛盾'。顺便说一句,孙作《寄光耀》一文,也有某些记忆不准之处,但无关大体。"由此可见,徐光耀先生认为,孙犁先生写给他的那封信时间为一九六三年。

然而,孙犁先生在致徐光耀先生的这封信中还写道:"这两天翻阅浩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虽然我是'跳'着看的,但很欣赏。"据查证,浩然先生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初版时间为一九六四年九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孙犁先生的研究者莫舍拉东先生在孙犁吧中发帖云:《芸斋书简续编》内有一封孙犁先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致冉淮舟的信可为佐证,较详细地谈了这次到保定的经过,并且也谈到了小说《艳阳天》。孙犁先生在致冉淮舟的信中写道:"我此次出门共十一天,在保定参观南大园、前辛庄两公社。去满城,过一亩泉,并游抱阳山。去安平,在老家待一天,路过安国,本拟去长仕、于村,以犹豫未果。在保定,该地文联同志招待,甚好……近读浩然长篇《艳阳天》(新出单行本),我觉得很好,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有政策。该同志在《红旗》工作,得有机会全面领会政策,并在农村工作一时期,似颇为努力。他的短篇我读得很少,得读此作,惊叹不已,也许是我自己少见而多怪吧。"由此可以断定,孙犁先生致徐光耀先生的这封信年份至少应为一九六四年,标注为"(六四)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比较准确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说明。徐光耀先生在《追思孙犁老师》一文中云:"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前后,我读孙犁新出的集子,才知道他在'文革'中两次自杀……进入新时期后……感到他的情绪仍不昂扬,甚至有时还陷在自杀的心境中。我很担心,于是就写信……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据孙犁先生在《曲终集》中《寄光耀》一文中所述,徐光耀先生所读到的那部书是《无为集》,而此书初版时间为一九八九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因孙犁先生对徐光耀先生这封来信的复信时间为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三日。所以说,徐光耀先生读《无为集》的时间当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之后至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三日之前。所以说,徐光耀先生在《追思孙犁老师》一文中云:"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更准确的说法应为:这是中断了二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因为从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或一九九〇年,间隔已接近三十年了。

让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曲终集》初版时间为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当时,孙犁先生虽已封笔,但头脑清醒,为何《曲终集》中此信落款时间亦为一九九〇年?难道当时孙犁先生已经无心或无力校读了吗?以孙犁先生之认真之细心,若其校读,是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为避免今后此类错误的出现,我想对书信集的编者们提一个建议:如果对写信者的写作时间实在搞不清楚,完全可以用"?"代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样做比似是而非的臆想要好得多。因为这样做,读者心中明白,可以自己去推测,去查证,而不致误入歧途。

附:孙犁先生致徐光耀先生的信

光耀同志:

昨晚写一信,今日即收到寄来之照片,欣赏一遍,非常满意。明芳的已经妥为转交,希勿念也。

李桂花那个人物,确实可做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

这两天翻阅浩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虽然我是跳着看的,但很赞赏。这几年确是有些作家在努力,在进步。我们都不能固步自封,要看看其他同志的成绩,多加努力——这是我随便想到的。

很希望早日读到你写的剧作。明年春季我们去白洋淀转转吧。

敬礼。

孙 犁

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参加了捍卫国门的战斗

贺熙成 口述 汤礼春 整理

我于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的一个贫农之家。解放后,我们家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我十分感谢党,拥护新社会。所以在我十七岁那一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五十四军到我们县来招兵时,我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军。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有点文化,身体也好,便如愿以偿。

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天,我所在的130师突然接到命令:做半个月的作战准备。我们即刻从农场转回军营,擦枪、领弹药、战前训练,紧张忙碌了起来。

半个月后,我们又乘车沿川藏公路出发,再次进藏。此次我们要参加的是打击印度入侵我国领土的战斗,把印度军队赶出国门去。我们54军仅我们师参加"中印之战"的东线战斗,由军长丁盛亲自指挥。由于我们师曾经进藏平叛,平叛后又帮藏民解放农奴,恢复地方政权,所以深得藏民的拥护,当我们师一万余人进入战斗前线时,身后就有两万余藏民帮我们修公路,运送粮草弹药。

我们师此次参加的战役是"瓦弄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该地区山高林密,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湍急,易守难攻,印军凭险而据,还大修地堡,配置极强的火力点,扬言可以把守一百年。

战役发起前,我们是很隐蔽地进入前线的。当时我在团部政治处当保卫干事。我发现我们团部隐蔽的对面山头有印军出没。为了在总攻开始前肃清对面山头之敌,团长派了两个侦察兵前去侦察,侦察员在夜里悄悄爬上敌人的山头,天亮后再利用岩石草丛的隐蔽来观察敌军的情况,经过一整天的观察,他们只发现有几个人头出现过,他们断定守这个山头的敌军只有一个加强班。团长决定组成一个尖刀连,在总攻发起之前,先将这个山头拿下。我听说后,立功心切,坚决要求下到尖兵连,参加这次战斗。政治处主任同意了,我很是兴奋,可临出发前,团政委发现了我,他不准我去,叫我留在团部。战后我猜测:他知道此次作战,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避免不了伤亡。他特别爱惜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部下,故不让我去。也的确如此,此次尖刀连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尖刀连连长根据侦察员的情报,说敌人只有一个加强班,故先期派了一个排冲锋,谁知快攻上山头时,敌人的火力骤然猛烈起来,先锋排的排长当场牺牲,其他战士也差不多全部阵亡了。根据敌人火力判断,把守在这个山头的敌人有一百多人,是个加强连。尖刀连连长只有亲自率领全连战士攻了上去,由于山太陡,机枪都架不稳,只有靠两个人抬起机枪才能射击,所以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我军又牺牲了一个排长和几十个战士,幸好守在山头的印军其实都是招募尼泊尔等邻国的雇佣兵,他们怕死,打了一阵后,见我们的战士勇敢,不怕死地直往上冲,便放弃了阵地,四处溃逃起来。结果居然有四个逃兵慌不择路地跑到我们团部前,当时我们在团部有的在看图,有的在擦枪,没想到会突然出现四个敌兵,幸好这四个逃兵是怕死的,一见我们的哨兵端枪喝问,走在前头的两个便举手投降了,而后面的两个掉头就跑,其中一个当场摔下山死了,另一个滚下山后就不见了踪影。四个小时后,从远处的山头有敌军的炮弹向我们团部打来。我们才明白,肯定是那个滚下山后的逃兵逃回去了,向上司报告说发现了我们的团部。敌人的炮火很猛,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团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小锹,要我们临时挖坑隐蔽,好在敌人的炮火都是从我们的头上飞过,落到我们后面的一个高一点儿的山头,估计敌人是判断错了,否则我们团部要吃大亏了。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我们师开始发动了"瓦弄战役",在扫清敌人的地堡群、火力点中,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共阵亡了四百多战士。由于我军作战勇敢,印军都胆寒起来,只抵抗了几小时就放弃了阵地,全面溃逃。仅仅一天,我们就结束了战斗。战斗结束后,经清点,除了打死几百个盘踞在地堡、火力点的印军外,其余几千个敌兵都逃得不见了踪影。丁盛军长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敌军的去向,大家一致认为:这几千个雇佣兵都是空投而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逃,肯定是四处乱窜,在周围的山上躲起来了。丁军长命令我们师全体官兵开始在周围搜山,果然如分析的那样,共搜出几千个敌军俘虏,我曾经担任过指导员的那个连就差不多抓了一个连的俘虏,连长因此得了特等功,叫我羡慕得不得了。

在我们搜山的过程中,印度军方还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已经溃逃,还在不停地用飞机向原先的阵地空投生活物资,只见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降落伞,我们都欢呼:敌人给我们送吃的来了。可惜的是当时的印度也不是富国,空投的罐头里装的都是豌豆、土豆,没有一点肉腥。

此次"瓦弄战役",我们师出了两个"战斗英雄",一个是排长周天喜,他在指挥全排连续爆破了敌人几个地堡后,当场牺牲了。另一个是陈代富,他当时在高机排当战士,当他们排奉命摧毁印军无名高地中央地堡群母堡时,负责爆破的战士接二连三地牺牲,排长就叫陈代富去执行爆破任务。陈代富机灵地滚到敌人的地堡前,将爆破筒塞入敌地堡时,被里面的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了进去,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离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通了部队前进的道路,陈代富也因此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战斗结束后,陈代富到我团来作战斗事迹报告时,是由我陪同他的。

这次战役后,我还奉命作了一段时间的"俘虏管理工作"。我们听从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对几千名印度战俘十分优待,当时我们穿的还是旧棉衣,却给印军俘虏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在吃的方面不仅比我们的战士还好,而且给他们每人每天发一包"大前门"烟抽。因为有许多俘虏信伊斯兰教,我们便组织他们做"礼拜",还组织他们开展打篮球等娱乐活动。后来,当我们将这些印军俘虏移交给他们的"红十字会"时,很多俘虏都抱着我们痛哭,不愿回国,有的还说他们愿当一辈子的中国俘虏。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了衡阳,从一个战士到团级干部,我在部队战斗生活了二十四年,每当我想起我的军旅生涯,就激动不已,心里就会涌出一句话:我曾为共和国站过岗放过哨,走上过战场,我为此而自豪,而骄傲!